

江西
社会科学研究文库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

朱林 温冠英 罗蔚 著

Z · G · C · T · J · J · L · L · S · X

江西人民出版社

RESEARCH LIBRARY OF SOCIAL SCIENCES I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

朱林 温冠英 罗蔚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朱林,温冠英,罗蔚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2

(江西省社会科学文库)

ISBN7-210-02673-8

I. 中... II. ①朱...②温...③罗... III. 经济学:
伦理学—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 IV. B8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563 号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

朱林 温冠英 罗蔚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光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875

字数:23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210-02673-8/B·98 定价:18.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

E-mail: 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钟书

繁荣社会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发展和繁荣的过程。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集中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社会科学的生命在于创造，在于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呼唤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呼唤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换言之，没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真正的发展和繁荣。理论贵在创新，创新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执着的追求和艰辛的探索；理论重在创新，创新需要有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理论功在创新，只有创新的理论成果，才能探索规律、把握规律，才能启示实践、指导实践，才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坚持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使命。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

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新世纪的世界,新世纪的中国,新世纪的江西,许许多多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许许多多的政治、经济、社会课题,迫切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去解答。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江西向为“文章节义之乡”,素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著称。在历史的长河中,江西不但涌现出许多名扬中外的文学家、艺术家,而且涌现出不少影响古今的学问家、思想家。但是,我们不能沉缅于先哲的辉煌,而应该创造更加璀璨的未来。江西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一直在为此努力,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世纪之交,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省社联大力实施“精品战略”,积极组织和扶持社会科学精品力作的撰述和出版,其实现形式是:推出“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工程,每年拿出一笔事业经费,资助出版10本理论上的厚重之作。这是我省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好事、实事,如此年复一年,坚持下去,必将蔚为大观。

21世纪,将是我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也将是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世纪。江西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大家努力啊!

祝愿社会科学研究精品力作不断问世。

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经济伦理学的兴起,可以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20世纪60—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和尼克松水门事件等的刺激,同时也由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等等,一门以“企业伦理学”为中心的新兴学科——经济伦理学在美国逐渐形成,随后很快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80—90年代在欧洲、日本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伦理学都呈迅速发展之势,各国和国际性的经济伦理学组织相继成立。1998年,研究经济伦理学的阿玛蒂亚·森(Sen, A.)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能否认的是,当代经济伦理学的兴起,对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经济伦理学论著的发表,既是我国学者独特努力的结果,也可以看做是对此的一种积极回应。当然,经济伦理学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除了外来影响之外,最深刻的社会基础,则在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不少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问题。这就突出了经济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充分论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正当性,为这一历史性进程确立适宜的道德规范,从历史的大尺度出发对其进行深刻的伦理反思。

进一步说,当代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不仅有其特殊的社会背

景,而且也有其深远的学术背景,即经济伦理学已成为当代经济学、伦理学和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同样,经济伦理学发展的这一学科特点,也充分体现在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学的主要成果中,即这些成果主要是在经济学、伦理学和管理学这三个学科领域中取得的。此外,我国近年来在翻译当代国外经济伦理学的文献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可以说,正是由于广大理论工作者听从时代精神的召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才使我国经济伦理学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从悄无声息到成为一个学科热点,并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

2 就我国当代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具体内容而言,除了联系实际的经验研究之外,在学科建设方面,主要就是所谓“一论两史”(经济伦理学理论和中、外经济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从近年来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重点。如果暂时撇开关于中国管理思想的大量论著,据笔者了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鸿翼的《儒家经济伦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王小锡的《中国经济伦理学》(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4 年版),唐凯麟、罗能生的《契合与升华》(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中华孔子学会主编的《儒学与市场经济》(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编的《儒学与工商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此外,还有不少单篇的相关论文。上述论著主要研究了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主体——儒家经济伦理的内在价值及其当代意义,对于我们发挥传统经济伦理的积极因素,自觉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特别是王小锡的《中国经济伦理学》从德性主义、功利主义、理想主义、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五个方面,概括了我国古代和近代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学科建设上具有开拓性。

当然,充分肯定先前对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成果,不是说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毋宁说,必须承认,无论从实践要求还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研究都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可以说,已有的对中国“经济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则带有断裂性,未能进行历史的完整的把握,多停留在片段上和一般的泛论上”(王淑芹、张鹤《国内经济伦理学研究综述》,载《哲学动态》2001年第3期)。从而,令人十分高兴的是,朱林等所著的《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以其对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系统、深入的研究,为改变上述的不足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本书从西周的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诞生起,一直写到近现代民族资本主义的管理伦理止。其间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主要流派的经济伦理思想均有涉及。因此,本书体系之完整、研究之深入是前所未有的。我相信,本书的问世,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学术界对中国经济伦理的重视程度。

高度重视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价值,可以说是当代中外经济伦理学研究者的共识。例如,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其不受自然经济局限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基本思想观点:一是人际和谐,二是天人协调。这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本位、克服自然’有所不同”(中华孔子学会主编《儒学与市场经济》,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同样,当代美国经济伦理学家唐纳森和邓菲也认为:“虽然我们不是中国人,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与经济伦理学之间有着极为类似之处。伟大的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所依靠的不只是法律,还有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和好的社会的共同的社会观念。……因此,虽然我们称之为‘经济伦理学’的这个领域里的许多早期著作出于西方人之手,经济伦理学本身却与中国的习惯相当符合。”([美]唐纳森、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本序第1页)从这些引证可以看出,中国的

经济伦理传统中包含着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需要我们加以研究和整理，并把它应用于当代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去。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不仅会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也可能有利于建设一个公正和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从而，这一切激励着我们中国经济伦理学工作者，继续努力地去研究经济伦理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伦理思想。

从这一角度再来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可以说此书的出版，把我国经济伦理学界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不仅有助于相关研究者开阔视野，深化当代经济伦理学和企业伦理学的研究，而且也有助于我国经济界的广大人士重视经济和企业伦理问题，强化自己的经济伦理意识，发扬民族优秀的经济伦理精神，提高整个经济生活的道德质量。此外，《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出版，不仅说明社会确实需要经济伦理学这样一门新兴学科，而且也说明它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由于本身所具有的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的包容性，为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具有远大的学术前景。至于充分发挥包括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精华在内的经济伦理学的社会功能的实质，在于我们如何在充分地、彻底地肯定市场经济合法性的基础上，深刻地自觉地把握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作为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的作用，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为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陈泽环

2002年5月4日于上海

目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萌芽

1

一、最初的德

1

二、德治主义雏形

2

三、义利之辨的发端

5

四、视农为本的缘由

7

第二章 孔丘：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奠基

10

一、春秋形势与孔丘思想的渊源

10

二、富国足民的财富观

13

三、获取财富的伦理标准

15

四、分配伦理和消费伦理

18

第三章 孟轲：儒家理想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

21

一、影响孟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因素

21

二、仁义之道及其人性基础

24

三、仁义之道的社会伦理表述

27

四、去利怀义的个人伦理

30

五、小结

32

第四章 兼爱相利的墨家经济伦理思想

34

一、经济生活中的道德标准与评价

35

二、义利同一的独特义利观	39
第五章 荀况：儒家现实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	43
一、人性与“欲多而物寡”的矛盾	44
二、道德理性对欲望的制约功能	47
三、礼义道德的“养欲”功能	50
四、解决物欲矛盾的根本途径	53
五、小结	55
第六章 道家无为的经济伦理思想	56
一、尊重规律的自然无为	57
二、反对干预的清静无为	60
三、真实的经济伦理	64
第七章 法家非道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	68
一、法家的功利主义	69
二、法家的人性自利论	71
三、“仓廩实则知礼节”与法家的道德观	75
四、重本抑末论	80
第八章 董仲舒的经济伦理思想	84
一、为封建经济形式辩护	85
二、“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87
三、反对兼并和垄断	90
四、简要评议	92
第九章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	95
一、脱贫致富是人性需要	96
二、财富是社会道德的基础	99
三、职业伦理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101
四、“善者因之”的自由经济主张	104

第十章	佛教经济伦理思想	108
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108
二、佛教的伦理学		113
三、伦理生活的宗教解释		120
第十一章	维护与冲击封建经济秩序的两宋时期经济伦理思想	124
一、重义轻利的理学经济伦理思想		124
二、理财即义的荆公学派经济伦理思想		129
三、重利重商的事功学派经济伦理思想		135
第十二章	传统与反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	139
一、元朝重商政策的推行		139
二、明代传统主流经济意识形态		140
三、“异端”与“叛逆”的反传统的经济伦理		149
第十三章	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萌芽	157
一、黄宗羲的“民本主义”经济伦理观		158
二、顾炎武的“用私论”经济伦理观		164
三、王夫之经济“自谋论”的伦理财富观		167
第十四章	明清之际商业伦理的繁荣	176
一、商帮兴起		176
二、商人的商业伦理观		177
三、民间对商品货币崇拜的道德批评		185
第十五章	地主阶级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经济伦理观	188
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伦理观		188
二、地主阶级保守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200

第十六章 农民“均贫富”的经济道德理想 204

一、“均贫富”的呐喊 204

二、《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追求 207

三、《资政新篇》中的经济伦理探求 212

第十七章 “中体西用”的洋务新政之思 216

一、富强的伦理目标与管理伦理的思想障碍 218

二、中体西用的经济伦理运用 222

三、曾国藩经济伦理思想简析 223

第十八章 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对传统伦理的

重塑 225

一、康有为的经济伦理观 227

二、谭嗣同的经济伦理思想 233

三、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 239

第十九章 民生主义中的经济伦理 247

一、孙中山民生主义中的经济伦理思想 247

二、章太炎经济伦理思想 257

第二十章 实业救国的经营管理伦理 260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260

二、经营管理中的伦理观 262

三、逐步理性化的民族资产阶级管理伦理 264

主要参考文献 270

后记 273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萌芽

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具有重义利之辨、崇俭黜奢、重本抑末、以民为本、不患贫而患不均等特点。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如果我们把目光回望,对我们的祖先最初对道德的思考及促使他们这样思考的原因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肯定会更加深刻和正确地理解这些特征。

一、最初的德

人类的经济行为与道德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这不仅因为为了谋生而获取物质财富的劳动活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中,在发生了个人与整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的时候和地方,道德才有可能发生。

在中国,“德”字始见于殷人留下的甲骨文。在甲骨文中,德字与“得”字的意义是相通的,是“行有所得”。依《说文解字》的意思,“德”与财产、财物密切相关。但是由于殷人“迷信鬼神,不重人事”,德的意义与当时国家的主要目的——战争、财产和祭

祀相联系。

德字被赋予普通的道德含义始于西周。殷末周初,中国古代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周人乘着破竹之势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和势力。据《逸周书·世俘》载,武王克商,灭国九十九,获战俘亿又七万余人,获民人三亿余人。在那个时代,打胜仗意味着获得财富。然而,取得了军事胜利、获得了巨大财富之利的周人,在惊喜之后很快就被一个现实的问题困扰——如何子孙永远保有通过武力夺来的政权和财富?这实际上是一个宗教或哲学问题,即周人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的结果,就是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自此,中国的古代社会由“迷信鬼神,不重人事”,过渡到“既信鬼神,又重人事”,德字开始具有了后世那样的普遍的道德含义。

对古代原德观念的考察表明:人类的道德观念从一开始起,就与经济活动有着密切联系。正因人类道德观念与经济活动有天然联系,所以伦理学与经济学实际上是相通的。

二、德治主义雏形

把一般道德观念提升到德治主义的高度始见于周公。正是在周公“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思想的基础上,孔、孟提出了“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最终奠定了儒家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周公姓姬,名旦,又名叔旦,周武王之弟,因采邑封在周地,故称周公。他是西周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我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名大思想家。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周公是孔子的偶像。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以及在吸取夏、殷二代灭亡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一

整套礼乐制度,成为孔子毕生追求的理想。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敬德保民”是周公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是他在总结夏、殷二代灭亡的教训时提出的。周人以前,人们迷信“天命”,统治者自视为“天子”,受命于固常不变的天。夏桀说过:“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史记·殷本纪》)由于以得天命自居,认为自己的统治是永恒的,夏、殷的统治者有所欲为,荒淫无度而不顾民之死活。然而“天”并没有像夏桀和商纣想像的那样,永远保护他们,他们在人民的反抗下丧失了统治地位。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们在总结夏、殷二代灭亡的教训时,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民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决定着统治地位的巩固与否;民是一面镜子,反映着国之兴衰。因此,天的意志实质上乃是民的意志。《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下》引《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基于这样的认识,周初的政治家强调:“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尚书·酒诰》),即以人民的好恶作镜子,以察政治之得失。民几乎和天处于并列的地位。然而,“天”就是“天”,民就是民,如何架起能够在天和民之间来去自由的沟通桥梁呢?对此,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德”成了沟通天和民的桥梁。

根据“以德配天”的理论,谁得到天的赞许,天就把治理天下的权力交给谁,他就获得“天命”。同时,天又是仁慈的,他关心民间疾苦和百姓愿望,人民拥护谁说明谁有“德”,天就把“天命”交给谁。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夏、殷二代的灭亡以及周受到上天的支持的原因就一目了然:周人说,夏桀无德,天于是“乃命令尔祖成汤革夏”(《尚书·多士》)。其初,“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诗经·大雅·文王》)。后来,“惟其不敬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周人有德,故“丕显文武,皇天弘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两周金文辞大系·毛公鼎铭》)。“文王在上,于照于

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周人终于取代商而成为天下主宰。可见：“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又《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因而《尚书·召诰》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一个王朝接受上天的任命之后，能够保持多久，这是无法知道的。惟一的办法，就是“敬德”以“怀保小民”。

《尚书·棣材》中说：“欲至于万年为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在周公看来，“敬德”乃是下保小民从而上受天命的关键。怎样敬德保民呢？周公提出了要“知稼穡之艰难”（《尚书·无逸》），“毋康好逸豫”（《尚书·康诰》），以及“明德慎罚”（《尚书·周书》）等等。这些已经蕴含了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爱民、重民，经济上富民、知百姓疾苦，生活上节俭，以减轻百姓负担等民本思想和德治主义的一切萌芽。

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德治思想和民本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期，黄帝轩辕氏见神农氏衰，诸侯互相攻伐，百姓受到暴虐，于是就“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舜受命后“稷播时百谷”以解决民之饥寒（《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夏本纪》还记载了舜、禹、皋陶讨论政事的情况：皋陶提出“在知人，在安民”。禹赞同皋陶的见解，说：“知人则知，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舜曰：“予欲左右有民，女（同汝）辅之（我欲帮助民，你们辅佐我）。”盘庚时期，“视民利用迁”（《尚书·盘庚》_中），为了民的利益迁都是“施实德于民”（《尚书·盘庚》_上）。这些都体现了重民、为民的民本观念。第一次把民本观念和德治相联系，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的，就是周公的“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思想。春秋时期，孔子在周公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爱人为核心的“仁”的学说和“为政以德”的理论。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孟子的努力，儒家的“仁政”理论最终形成，“民贵君